

国际秩序与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与影响机理

王玉主^{1,2}, 王伟³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07;
2. 广西大学 中国—东盟研究院, 广西 南宁 530003;
3. 深圳证券交易所, 广东 深圳 518038)

摘要: 两轮经济全球化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共性是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秩序之间存在的同步性;经济全球化的起点均处于国际秩序的更迭期,并伴随着秩序企稳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全球化的形成和深化依靠稳定的国际秩序基础,其发展特征及利益分配结果深受国际秩序的影响。当经济全球化缺乏其赖以发展的秩序基础时,其进程就会戛然而止。本文基于国际秩序的视角回顾了两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初步阐释了国际秩序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机理,认为秩序经由其构成要素影响了全球化的发展路径。文章还对何种类型的国际秩序更有益于经济全球化的运行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国际秩序;经济全球化;主导价值观;制度安排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2021)12-0076-08

经济全球化发展阶段的划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其界定指标通常包括贸易开放度、直接投资流量或者移民规模等数据,但严格依赖指标有可能与全球化的具体进程产生常识性的冲突。本文结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和罗伯特·吉尔平等人的研究,将经济全球化划分为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1914年一战爆发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的两轮进程。两轮经济全球化常被忽略的一个关键共性是全球化的起点均处于国际秩序的动荡整合期,并且伴随着秩序企稳后,经济全球化走向高速发展阶段。那么,国际秩序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间的这种联系是偶然还是必然?如果存在某种必然联系,这种联系又是通过何种机理发挥作用的?接下来本文的研究将从梳理两轮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始,探寻国际秩序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机理,力图对上述两个问题作出回答。

一、国际秩序视野中的经济全球化

(一) 新帝国主义均势秩序和第一轮经济全球化

19世纪的最后20余年见证了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欧洲列强将自身的经济优势和军事霸权转化为系统性的征伐和统治,这些有计划的侵略行为最终催生出了一个新的帝国年代。1871年普法战争之后德意志邦国统一,后者的强势崛起动摇了以“欧洲协调”为特征的维也纳式均势体系。伴随着工业的成熟和海外市场的拓展,列强矛盾逐渐激化,欧洲原先基于合法性和权力微妙平衡之上的地区秩序日渐式微,转而愈加依赖结盟体系。^①于是,灵活的多极均势转变为僵化的“竞争性联盟均势”,两个敌对阵营,即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同盟国和英国、法国、俄国协约国之间的均势共同塑造了欧洲的地区秩序。^{[1](P133)}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8JZD046)

作者简介: 王玉主(1968—),男,山东潍坊人,中国社会科学院 APEC 与东亚合作中心主任,二级研究员,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秘书长,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区域合作研究;

王伟(1994—),男,安徽淮南人,深圳证券交易所博士后,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世界经济研究。

^① 亨利·基辛格认为国际秩序的生命力取决于他在合法性和权力之间所做出的平衡,而两者间绝妙的均势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几十年来的主要特征,参见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75页;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29页。

新帝国年代起初并不存在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全球性秩序,19世纪上半叶的世界由多个相对独立的地区秩序组成,但伴随着科技革命助推下的殖民侵略,诸如众邦林立的印度、中华朝贡体系等原有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迅速消解,欧洲将本地区秩序强加于其他秩序之上并逐渐扩张为全球性的。^① 国际秩序的重心从合法性转向权力,这也就意味着旨在约束侵略行为的合法性原则逐渐为帝国们所忽视,均势便以牺牲小国利益为代价来实现大国的理性自利。

新帝国主义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具有双重属性:决策机制上,欧洲大国依赖于以协约或同盟形式存在的均势体系;治理路径上,则表现为在丛林法则理念影响下的殖民扩张。前者局限于帝国之间的双向互动,后者则是列强对殖民地区的单向征伐。两者互为因果,相互制约,殖民扩张冲突或领土的分割往往通过均势下的多边外交来解决,而均势的发展又深受帝国势力范围的此消彼长所影响。均势秩序显然不具有普适的文明特征,欧洲通过竞争性的两极联盟实现了和平,^②但其他地区则大多处于一种有规则的弱秩序状态,而所谓的规则也带有强烈的丛林法则属性。

这一时期,国际会议和大国外交成为欧洲列强管理地区和全球事务的主要方式,和平的维系、权力的分配以及大国关系的协调是通过一次次定期会晤来实现的,彼时还未能形成一个统筹全球经济或政治事务、组织程度较高的多边机制或超国家机构。^{[2](P23-25)} 这种建立在会晤和协约之上的弱国际秩序为欧洲本土带来了难得的和平时期。自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的40年间,不曾有任何战争直接发生在两个欧洲本土帝国之间,即使发生在殖民地前线的冲突也往往以一些双边安排来化解。正是新帝国主义的诞生以及和平时期的到来,客观上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交流和贸易投资活动,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第一轮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由此拉开帷幕。

这是一轮由欧洲帝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列强创建的主权原则、协约关系、同盟体制以及国

际法等制度约束着国家间的交往,虽然大西洋西岸的美国在巩固了区域霸权后开始进行全球扩张,但总体上对全球事务的影响还相对有限。^{[3](P24-25)} 世界经济不再是各地区经济活动的简单加总,跨境铁路、航运技术和电报系统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交易成本的大幅下降,加深了各经济单元在横向层面上的互动和融合。世界商品贸易的价值从1851年的6.41亿英镑上升到1880年的30.24亿英镑,在一战爆发的前一年达到了78.4亿英镑,^{[4](P505-507)} 世界工业总产值也在1870~1913年间增长了4倍。^{[5](P74-79)} 英国和美国农产品及工业品价差迅速下降,欧洲与亚洲商品价格趋同也表明这期间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显著加快。在人员和货物加速流动的背景下,欧洲的资本和技术与“未开化”地区的原料和劳动力相结合,首次确立了工业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农业国家出口初级产品的国际贸易分工格局。^{[6](P51-57)}

新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建立在殖民扩张基础上的、单向和被动的全球化,并逐渐演化出了三大经济特征。其一,欧洲大国在19世纪70年代陆续实行的金本位制充当着核心保障机制。卡尔·波兰尼指出金本位制是构成19世纪文明最具关键性的制度,在稳定国际汇率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③ 由于缺乏对国际金融交易的有效控制,一战前国际资本流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欧洲政府将维持可兑换的黄金制度作为优先议题,经常以牺牲私人部门的经济利益为代价,通过提高中央银行利率来维持固定汇率。黄金作为国际货币后,跨境投资和贸易活动面临的货币贬值风险由此大大降低,推动了进出口贸易和海外投资的迅速增长。

其二,落后地区的国家在经济霸权和殖民侵略的双重压迫下,被动地参与到全球市场中,逐渐形成了中心—外围式的国际分工体系。机械化大生产对于原材料的需求和大量最终产品对于消费市场的依赖,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内在动力,^{[7](P44-45)} 落后地区开始参与到专业化生产和国际分工中,生产与消费愈加依赖外

① 美洲大陆起初在“门罗主义”的影响下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区域秩序,随着美国参与全球事务后开始融入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参见章永乐:《威尔逊主义的退潮与门罗主义的再解释——区域霸权与全球霸权的空间观念之争》,《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3期,第97~109页。

② 张宇燕等人最近对国家安全的分析也认为,均势安全是可能的出路。参见张宇燕、冯维江:《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第140~162页。

③ 波兰尼曾描述道,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有时需要用舰炮来维护势力,但更为常见的是利用国际货币体系来达到目的,他确保伦敦金融城的影响力得以扩散到许多服膺于这个新国际秩序主导国之处,参见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3~56页。

部市场。大规模的国际资本输入进一步加强了殖民地对欧美宗主国的依赖,逐渐形成了落后地区依附于帝国发展的局面。

其三,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是在各工业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背景下进行的,而后者恰恰是帝国扩大和深化市场的重要途径。在1873~1886年的经济萧条之后,市场经济的各种制度,例如推行金本位制,只有伴随着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才能为殖民地国家所接受,严格限制市场准入也有助于缓解帝国的生产过剩。^① 保护主义政策让列强得以在殖民地和其他大国之间设置贸易屏障,将当地零散的竞争性市场转化为本国企业的垄断市场,间接拓宽了世界工业的基础,并最终通过加强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促进了全球化进程。

(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及其导向下的经济全球化

一战的爆发打破了欧洲帝国之间竞争性联盟均势,国际秩序的溃败导致经济全球化赖以发展的和平环境不复存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化水平在许多层面上都出现了倒退,经合组织成员国贸易开放度直到1970年左右才回到一战前的水平。^{[8](P23~53)} 20世纪80年代,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加速了全球市场的构建,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体系得以形成。不同于一个世纪之前,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有着较为显著的文明属性和规则导向特征,制度因素在维系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建立起一整套多边机制和国际规范,塑造了符合其利益偏好和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美国在19世纪后期实现了经济崛起,1872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1898年美西战争的胜利为标志,美国开始涉足大国政治。从加勒比海到东南亚海域,世纪之交的美国通过开展横跨两个大陆的外交和军事行动来延伸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受孤立主义政策的影响,一战前美国对于国际秩序的改造是局部和零星的,并没有改变欧洲主导国际

事务的事实。^{[3](P15,24)} 两次世界大战后,19世纪末的多极世界被20世纪中期的两极格局取代,二战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全球60%,工业生产总值接近三分之二,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无出其右。^{[9](P317)} 伴随着对外政策从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以及在经济和安全领域拥有的绝对优势,美国开始以多元化的原则来制定体现自身利益的制度规范。

一直到70年代,处于霸权巅峰期的美国通过创建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制度规范,塑造了一套基于安全联盟、相对开放的经济政策和多边体制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10](P63~80)} 这一时期的国际经济活动带有霸权合作的特征,美国通过提供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制度、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经济援助以及集体安全机制等国际公共产品,来获得其他国家对于霸权国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的认同,从而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并实现了国际秩序的稳定。^{[11](P84~88)}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促进战后经济复苏、构建一个基于规则的开放经济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文森特·凯布尔评价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成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将全球化水平恢复到1913年的程度。^{[8](P23~53)}

与一个世纪前均势秩序相似的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最初也只是地区性的,直到冷战结束后,北约东扩、俄罗斯和中国开始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美国才得以在经济层面上将国际秩序扩展至全球主要国家。^② 事实上,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全球经济活动并没有表现出和19世纪末有什么本质的不同。^{[12](P24)} 冷战期间政治权力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阻碍了市场自由扩张和资本跨境流动,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柏林墙的倒塌是开启一个扁平的全球化体系的基础性一步,自此大国开始收缩政治对社会生活的干预。^{[13](P67~70)}

后冷战时期的主要议题就是经济全球化。^[14] 当苏联领导的政治体系崩塌后,原本其势力范围内发展出的经济制度和生产网络也随之瓦解。伴随着前东欧集团全面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亚洲

^① 霍布斯鲍姆指出新殖民主义是帝国进行经济和政治竞争的副产品,同时又因贸易保护主义而得以加强。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对海外市场和资源的依赖,以及在许多地区已经享有事实上的垄断地位,英国是这一时期唯一继续坚持自由贸易政策的主要工业国。参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贾士蘅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42~45、86页;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06, pp. 99~100.

^② 需要说明的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所谓的全球性是一个局部概念,这一秩序所依赖的集体安全联盟(如北约),以及西式自由主义价值观只是局限于特定国家之间,但在经济层面上,全球主要国家都已经融入其中。另外本文将“国际经济秩序”视为国际秩序在经济领域上的应用和延伸,是后者的一个子集。参见Joseph S. Nye,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Hegemony from Wilson to Trump”,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5, No. 1, 2019, pp. 63~80.

发展中国家贸易和投资壁垒逐渐消除,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着跨境运输和信息通信技术的持续进步,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布局成为可能。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国际直接投资为载体的生产要素合作逐渐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本质特征,发展中国家将本国的劳动力、土地等不易流动要素和跨国公司的产业资本、品牌设计、生产技术和经营理念等易流动要素充分结合,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15](P66-73)}随着生产程序的地理转移在技术和效益上变得可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生产网络逐渐形成,发展中国家也第一次成功地利用本国廉价的劳动力实现了在产品和服务上的比较优势。^{[12](P31-32)}

第一轮经济全球化表现为北方国家的工业化和南方国家的去工业化,并拉大了原本收入水平接近的国家之间的财富差距,而第二轮则通过逆转上述工业化进程实现了发展机会上的均衡。^[16]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尤为显著的一点是众多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市场的速度之快,通过嵌入产品生产的部分环节而非建立起完整的生产流程,南方国家得以迅速利用其比较优势完成特定环节的生产任务。1980年发展中国家出口中的工业制成品比重还不足30%,到了1998年这一比例攀升至80%左右。^{[17](P187-203)}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促成了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南北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显著缩小。1980到2010年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商品贸易总额中所占份额从25%增加到47%,在世界经济总产出中所占份额从33%提高到45%。^{[18](P43)}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全球化不存在任何有效的国际机构或正式的全球规则,南北国家经济互动的收益不成比例的为帝国所有。本轮基于多边经济体制的全球经济融合虽然存在霸权收益,但确实为发展中国家主动参与全球化、实现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规范化的路径。

二、国际秩序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机理

经济全球化从来就不是一个必然的进程,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内全球交通运输成本不断下降,但贸易额未能实现连续增长。基于劳动生产率相对差异的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国际贸易可以提高各国福利水平,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从来没有离开过主权国家的政策工具箱,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第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各国政府对于国际经济活动相对收益而不仅是绝对收益的关注,以及外向型经济发展路径的政治和安

全风险意味着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无法解释全球化的起伏和发展特征。本文基于罗伯特·吉尔平笔下国际经济扎根于主权国家所构建的国际体系这一基本设定,构建国际秩序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机理,以探析秩序是通过何种路径刻画了全球化进程。

在梳理两轮经济全球化进程时,发现了一个常被忽略的关键共性,即全球化进程和国际秩序变化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同步性,经济全球化的起点均处于国际秩序的更迭期,并且伴随着新秩序稳定后全球化实现了高速发展。现有的文献较少讨论秩序在塑造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深化依托于一种稳定的国际秩序基础,并且其发展特征及利益分配结果深受国际秩序的影响和约束,接下来将尝试对这一影响机理作出阐释。

国际经济活动扎根于主权国家所构建的国际体系中,相应地,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也依托于某种国际秩序中。17~18世纪重商主义的盛行证明国际经济的形成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一国对国外商品和资本开放市场的决定会损害一部分群体的利益,从而可能引发政治反应。构建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需要各国承担一定的政治和安全风险,在确立经济活动的规则和发展方向上也有赖于大国发挥关键作用,国际经济的形成由此依托于国际体系的构建。^{[11](P36)}进一步地,经济全球化是在特定时间内表现出来的一种有规律的、覆盖范围广泛的国际经济活动,而国际秩序又是国际体系的一种有序行为状态,结合19世纪末均势秩序以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构建某种稳定的国际秩序是经济全球化诞生的前提和基础。当全球化缺乏其赖以发展的秩序基础时,如一战的爆发导致均势秩序的溃败,又或冷战时期全球性秩序尚未成形,其进程就会戛然而止。

有关国际秩序概念和构成要素的定义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学术标准,阎学通教授曾对其做出过较为全面分析:国际秩序是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依据国际规范采取非暴力方式处理冲突的状态,其构成要素包括国际规范,主导价值观,以及国际制度安排。^{[19](P1-32)}本文基于阎学通教授对于国际秩序相关理论的研究,来分析秩序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机理。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与有着扩张属性的资本以及技术革命结合在一起,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和结构,刻画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征。

首先,国际规范是秩序内的国家应对国际事务所依据的行为标准,他确立了作为经济全球化基本单元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地位和互动方式,而国家间相对地位的高低关系到全球化的决策机理、分工体系和利益分配结果。例如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主权平等规范赋予了发展中经济体相对平等的国际地位,后者在多边贸易体制谈判等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有所增加,国际社会也开始关注中小国家的发展诉求和利益所得。其次,国际主流价值观决定了国际规范的制定方向和原则,反映了秩序主导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基本观点和看法,主导价值观在国际经济层面的投射则表现为经济全球化的具体发展理念。例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将其推崇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推广为几大核心国际经济组织的主导理念,推动各国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干预,推行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这些主张后来发展成为一国参与经济合作、获得国际贷款应遵循的改革方向。最后,制度安排涉及国际规范的机制化建设,指秩序参与国利用联合设立国际机构或签订国际条约等方式维护国际规范,而国际经济制度安排通过管理和约束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方式,直接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路径和特征。图1大致描述了这种影响机理的发生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许多因素,国际秩序对全球化是影响而非决定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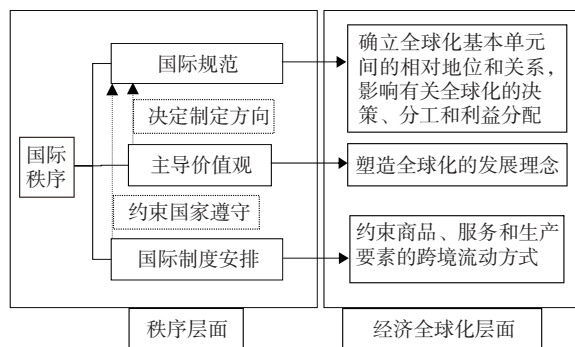


图1 国际秩序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机理

新帝国主义时期的均势秩序在决策机制和治理路径上有着双重属性,帝国之间的关系是高度竞争性的,只有在这些国家之间才有对领土和主权的尊重,而帝国与殖民地国家则建立在殖民或半殖民的制度之上。^{[20](P13-24)} 欧洲帝国主义作为第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政治结构,完全主导了后者的进程和方向。^{[21](P294)} 全球化发展的动力源于两极均势下的殖民扩张,其进程的深化建立在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排他性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非自由贸易之上。充当大国利益交换筹码的

“未开化”地区,时常面临统治者易主或政策改弦更张的境况。伴随着两个敌对阵营权力竞争的激化,经济动机越来越沦为次要目的。对一战前夕的英国而言,经济政策的主要功能不再是维系贸易和投资活动,而是为了强化自身国际威望、捍卫政治和战略利益,^{[22](P69-72)} 作为结果,经济全球化表现为进程的高度不稳定以及利益分配结果的高度有偏。

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依托于美国所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后者以其制度化和自由化的特征而有别于以往任何秩序,^{[23](P25)} 全球化进程也因此表现出不同的偏好。战后美国试图规避19世纪末英国所面临的霸权困境,即为了打造自由贸易体系而不得不放弃相当程度的政策自主性,于是通过建立一系列纷繁复杂、相互支持的国际机制,再结合主要大国的引导,美国希望世界经济能够朝着开放的目标自我实现。^{[24](P21-42)} 这些国际机制所制定的经济规则一方面确实促进了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提高了全球化参与国的福利水平,但另一方面,国际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经济活动的收益分配,规则的制定者通过塑造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经济秩序,如根据本国偏好来决定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获得额外的霸权收益。^{[25](P67-76)} 于是,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结果从高度偏向帝国转为一定程度的偏向规则制定者。

与此同时,国际秩序的自由化倾向推动着经济全球化脱离各国社会体制的束缚,也因而招致抵触。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并逐渐上升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理念。这一理论认为政府对于市场的限制是国家发展失败的原因,应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开放国内市场,消除贸易与资本流通障碍。^{[11](P276-284)} 但正如波兰尼“双重动向”理论揭示的,市场和社会包含着两种对立的力量:自由放任的动向以扩张市场,以及反向而生的保护主义以防止经济从社会中脱嵌。^[14] “新自由主义”对于缩减政府规模的强调,与普通民众需要政府积极应对开放市场的冲击产生了矛盾。主要大国政策取向因政党之间的博弈,便不断徘徊于放任市场自由扩张和迎合国内政治诉求之间,缺乏全球性社会体系支撑的经济全球化由此经历着持续性的周期波动。

三、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秩序基础

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依托于某种稳定

的国际秩序,秩序的构成要素与资本等生产要素相结合,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刻画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征。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全方位的,例如“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美国领导的军事同盟对全球化的直接影响就相对有限。国际秩序的塑造是一个极为宏大且系统性的工程,在有关其未来走向的讨论中,本文将主要关注秩序中对经济全球化有着关键影响力的部分,并尝试回答何种类型的国际秩序更有助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具体涉及秩序的有界与否、主导价值观的包容性以及国际经济秩序的开放度。

(一) 无界的国际秩序

从涵盖成员国的范围上来说,国际秩序可以划分为包含所有主要国家的无界秩序和局限于特定国家之间的有界秩序。^{[26](P7~50)} 大国之间的互动状态是判断国际秩序有界与否的关键因素,有界即意味着至少有一个主要国家处于秩序之外。在相互竞争的有界秩序中,战略资源会被不成比例的用来维护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利益,难以以为经济全球化提供稳定的秩序环境,因而支撑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国际秩序一定是无界的。两轮经济全球化的起步阶段,国际秩序都经历了从有界到无界的转变,新帝国主义时期欧洲通过殖民侵略将均势秩序扩张为全球性的,冷战后中国和俄罗斯先后在经济层面上融入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经济全球化也在国际秩序完成转变后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

在高度竞争的有界秩序下,对经济活动的关注会让位于政治和安全考量。正如吉尔平指出,在决定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征时,政治而非经济层面的因素通常更具有决定性。二战后期,正是在感受到苏联的威胁后,美国进一步意识到领导世界经济的必要性。如果不是为了巩固反苏联盟,类似于马歇尔计划这种特别的财富转移很可能就不会发生。^{[11](P8, 36~38)} 冷战期间美国领导的是一个有界的国际秩序,目的是与苏联领导的另一个有界秩序展开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霸权处于巅峰的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期间,尽管促成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的多边体制已经基本建成,但世界经济也仅仅是处于缓慢复苏阶段,却并没有以全球化的高速发展作为结果。此外,就经济层面上而言,有界的国际秩序通常意味着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相对隔离的市场,额外增加的交易成本以及经济活动边界的缩小,都会极大地限制经济活动参与者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能

力。因此,尽管有界秩序内部仍会有经济合作安排,但通常规模有限且主要目的还在于增加秩序本身的竞争力,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

支撑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秩序一定是无界的,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和美国当前阶段的竞争关系不断激化,南北国家无法在WTO改革、国际经济组织的代表性等关键议题上达成合作共识,世界政治发展成为约翰·米尔斯海默笔下的中美各自领导一个有界秩序相互展开权力竞争,可以预料到的是,自金融危机后降速的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在挣扎中前行,甚至随着竞争的激化有可能面临覆灭的境地。正如大国在决定秩序有界与否中起主导作用一样,大国关系的走向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未来也至关重要。

(二) 包容的价值规范

“自由主义”常被用来刻画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一词本身就带有一定的误导性,因为他从来就不是全球性的,也难言足够的自由开放。^{[10](P63~80)}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是局限于西方阵营内部的秩序,冷战后也仅是在经济层面上扩展到全球性的,其所依赖的集体安全联盟(如北约),以及自由民主等价值规范只是局限于特定国家。在这一秩序下,欧美等国长期以西方的价值规范作为衡量一国体制正当或优劣与否的标准。20世纪80年代,国际秩序的自由化倾向推动着国际经济合作从注重保护国内社会的“内嵌式自由主义”转向强调放松政府管制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组织开始根据“华盛顿共识”来调整运营目标和模式,而按照新自由主义原则进行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共识所承诺的经济繁荣。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基础逐渐被破坏,在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国际秩序的主导价值规范面临合法性危机。

经济全球化的跨国界活动带来了全球经济事务的“低政治化”,表现为国际经济活动的决策者从主权国家扩大到多边合作机制、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但国家仍然是体现政治权利与责任统一、体现民主统治原则的基本单元,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国际秩序只能以主权国家为基础。^{[20](P13~24)} 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离不开主权国家的保驾护航,后者需要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副作用。罗德里克认为民族国家是维持稳定的最好集群,因此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佳单元。国际秩序需要摒弃“自由主义霸权”思维,回归到威斯

特伐利亚规范下对国家主权平等的尊重,不再以推行单一价值观为目的干涉内政或侵犯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性,破坏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单元。这并不意味着一国在领土范围内拥有不可约束的绝对权力,国际社会仍然需要对国家权力的适用范围和方式加以约束,但各国让渡一定主权所实现的超国家决策机制必须具备普遍的适用性以及标准的一致性,规避个别国家“合着用、不合则弃”从而凌驾于规则之上的情况。

(三) 开放多元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局部性和非自由特征不仅表现在秩序的主导价值规范上,在秩序的制度安排层面也同样有所体现。尽管国际秩序在经济领域中已经涵盖了全球绝大部分国家,但秩序的主导权仍然局限于西方国家内部,新兴经济体长期被排除在全球经济事务的决策机制之外,在集体性崛起后并未获得与自身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制度性权力。现有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有着明显的危机应对属性,2008年金融危机后,南北国家为协调各国扩张性政策、加快复苏进程举办了G20峰会,后者很快取代G7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平台。但当危机暂时解除后,需要各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深层次改革的时候,发达国家让渡国际经济合作决策权的动力显著减小,例如IMF早于2010年达成了提高新兴经济体投票份额的改革方案,但美国国会迟迟不愿批准此项协议,拖延了5年后才最终通过。

此外,从美国否决日本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提议,以及他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态度来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建设具有较大的排他性。新的机制即便是符合次区域发展需要、有利于国际经济合作,但只要和美国存在利益冲突,就会招致其质疑和反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排他性以及的区域发展多样性关注的不足无疑会限制更深层次的经济合作,因此需要在制度安排上变得更加的开放多元,照顾到不同地区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当前国际经济合作的区域化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寻求加强区域经济联系来应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动荡。2012年以来,欧洲、亚洲和北美地区的跨境供应链中来自本地区的国外投入所占份额呈较为明显的增长态势,《经济学人》认为新兴跨境贸易的区域性特征越发显著,符合地缘政治的发展方向以及供应链变短的趋势。^{[27](P17~20)}全球生产网络的细化以及运输和通信成本的下降推动了区域内商品贸易比

重从2000年的51%下降到2012年的45%。然而近些年由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企业为减少跨境贸易风险,纷纷建立起靠近需求的生产,全球商品贸易中来自区域内部的比重从2013年起上升了2.7%,其中欧盟和亚太地区成为主要增长点。^{[28](P38~39)}区域韧性比以往更加重要,交叠的区域秩序会成为未来国际秩序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29](P29~44)}不同地区因经济结构、文化、宗教和政治体制的差异而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和融合程度,国际社会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看待区域成员探索新的合作模式。新的制度安排通常是对现有合作框架的有益补充,增强多边机制在具体议题或地区上的治理能力,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安排应当有被接纳为国际经济秩序组成部分的机会。

四、余 论

以上分析显示,国际秩序对经济全球化进程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其背后的国际关系动力学还值得更进一步的分析探讨。要塑造有利于经济全球化走向深入的国际秩序环境,首先需要厘清国际秩序作用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机制,本文对此作了粗浅的初步探讨。但对经济全球化来说,目前面临的更大挑战来自国际秩序发展的不确定性。国际秩序陷入不稳定状态将制约经济全球化,而一种新秩序的确立,将有助于塑造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特征。

当前世界正处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而这种秩序正面临着以中国为首的第三世界的崛起带来的挑战。对中国来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非中性制度安排是限制中国进一步发挥国际影响力的主要因素,并全球影响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但目前对中国影响更为迫切的是这一秩序本身的衰退和弱化,经济全球化所依托的秩序环境面临着动荡,因而中国也在多个场合表示出对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支持,以及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决心。国家利益构成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基础,随着对国际经济合作态度的转变以及全球化参与程度的深化,中国的国际秩序主张也相应地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建立国际新秩序,到21世纪初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反映出一种更加务实可行的秩序观。国际秩序的内部危机催生了秩序变革的必要性,作为国际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和崛起中的大国,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参与塑造国际秩序的演变方向,构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秩序基础。

[参考文献]

- [1] Ian Clark. *The Hierarchy of States: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9.
- [2] 张丽君. 全球政治中的国际组织(IGOs)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 [3] 王立新. 踌躇的霸权: 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 [4]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下) [M]. 吴象婴,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5] 陈从阳. 全球化与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 [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3, (3).
- [6] 张礼卿. 经济全球化的成因、利益和代价 [J]. 世界经济, 1999, (8).
- [7] 唐士其. 全球化与地域性: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M]. 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08.
- [8] Vincent Cable. *The Diminished Nation – State: A Study in the Loss of Economic Power* [J]. *Daedalus*, 1995, (8).
- [9]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极端的年代: 1914—1991 [M]. 郑明萱,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 [10] Joseph S. Nye.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Hegemony from Wilson to Trump* [J].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9, (1).
- [11] 罗伯特·吉尔平. 全球政治经济学: 解读国际经济秩序 [M]. 杨宇光, 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12] Paul Collier and David Dollar. *Globalization, Growth, and Poverty: Building an Inclusive World Econom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3] Robert Antonio.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In: George Ritzer (Ed.),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Globalization* [M]. Malden, MA: Blackwell, 2007.
- [14] 卡尔·波兰尼. 巨变: 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 [M]. 黄树民,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 [15] 张幼文, 薛安伟. 要素流动的结构与全球经济再平衡 [J]. 学木月刊, 2013, (9).
- [16] Richard Baldwin and Philippe Martin. *Two Waves of Globalisation: Superficial Similarities,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J]. NBER Working Paper, 1999, (6904).
- [17] Will Mart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hanging Participation in World Trade* [J].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03, (2).
- [18]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南方的崛起: 多元化世界中的人类进步 [R]. 2013.
- [19] 阎学通. 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 [J]. *国际政治科学*, 2016, (1).
- [20] 李强. 全球化、主权国家与世界政治秩序 [J]. *战略与管理*, 2001, (2).
- [21] 小约瑟夫·奈, 戴维·韦尔奇. 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 理论与历史 [M]. 张小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 [22] Zara Steiner and Keith Neilson.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Second Edition)* [M]. London: Macmillan, 2003.
- [23] Michael Mazarr, et al.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Order* [M].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2016.
- [24] John Ikenberry. *Stat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merica and the Logic of Economic and Security Multilateralism*. In: Dimitris Bourantonis et al., (Eds.), *Multilateralism and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 [25] 李向阳. 国际经济规则的形成机制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6, (9).
- [26] John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4).
- [27] The Economists. *The Global List: Globalisation Has Faltered and Is Now Being Reshaped* [J]. *The Economists*, 2019, (9127).
- [28]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 [R]. 2019.
- [29] 唐世平. 国际秩序的未来 [J]. *国际观察*, 2019, (2).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istorical Process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Wang Yuzhu¹, Wang Wei²

- (1.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ASS, Beijing 100007, China & China – ASEAN Research Institute,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3, Guangxi, China;
2.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Shenzhen 518038,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A commonality between the two round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at is easily overlooked is the synchronization betwee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starting poi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in a period of international order transition and enters the stage of rapid development along with the stabilization of the order. The formation and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 rely on the stable found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which deeply influence its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Whe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lacks the order to support its development, its process will come to an abrupt hal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two round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explains tentatively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argues that international order influence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rough its constituent elements. Then, it discusses which form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ord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leading value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责任编辑:李 官]